

新中国 70 年外交哲学进路^{*}

——革命、平等与引领

刘贞晔

【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外交哲学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以革命哲学为主导的阶段，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以平等哲学为主导的阶段，以及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更为突出的新时代。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它起始于“一边倒”方针，中间经过万隆会议、中苏大论战以及“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最终使中国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平等外交哲学既受毛泽东时代革命哲学探索的启迪，同时也是在批判革命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强调国家间一律平等的工具价值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的性价值，成功推动了中国国内发展，并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深度参与者。引领外交哲学萌生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阶段，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得到凸显。它强调中国在外交上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与平等哲学和革命哲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的外交哲学内涵，中国有望在此哲学价值指引下走向一个新的大外交时代。

【关键词】 中国外交 70 年 外交哲学 革命哲学 平等哲学 引领哲学

【作者简介】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钱端升讲座教授（北京 邮编：100088）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5-0033-21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5002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JSJ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演进过程，这些哲学理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对中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外交实践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三大外交哲学演进中所包含的大国意识、理想主义、立足自身以及认知偏差等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反思。考察和总结 70 年来的外交经验，不能不深入剖析每一个外交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外交哲学。

一、革命哲学

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而不仅是国内革命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革命外交哲学始于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今天我们对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合理性大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利益观解释虽然也能说得通，但还是有一些勉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理念的外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其向外延伸的必然就是中断旧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写照，由此逻辑推衍，新中国在外交上对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也必然就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选择。

“一边倒”外交方针在当时新旧政权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确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新生政权安全需求，有助于获得苏联支持和帮助，缓解来自美国及其支持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安全威胁。当然还不止于此，新中国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加入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盟，也是革命哲学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国内革命的逻辑也要求在外交上实现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这一逻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 30 年中反复呈现并维持了较长时间。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任务，并在党的八大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外交作为内政的

延续，显然也要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革命的需要出发进行调整，历史的演进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外交行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新变化，并在新的独立自主需要的基础上展开新探索。

（一）参加万隆会议的探索

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表明了我国作为亚非地区众多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的“独立民族国家”一员的立场，提出了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处理矛盾分歧及和平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反对殖民压迫，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主张。特别是在大会上针对许多亚洲国家对于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将会引发战争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发表了愿意同美国谈判的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① 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改变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和支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大国参与的会议，其目的就是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也反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干涉和“输出革命”。中国作为以“一边倒”为外交方针的苏联同盟国参加万隆会议，说明中国在外交实践上开始寻求摆脱“一边倒”的束缚，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在万隆会议最初的酝酿阶段，中国就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会议过程中虽然遭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② 的恶劣阻碍，但是仍然成功参加了会议，这说明中国已经下定重大政治决心和做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万隆会议召开前的 1955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参加万隆会议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0 页。

^②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的民航包机，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先行人员乘坐该机从香港起飞后在印尼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毁，11 名代表团成员遇难，周恩来总理因应缅甸领导人邀请访问临时改变计划而得以幸免。事后调查该事件为国民党特务预先安放定时炸弹导致飞机空中爆炸。

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与会总方针。^①在这个总方针中，参加万隆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和“促进民族独立运动”，而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在外交上要摆脱苏联的世界革命目标和苏东阵营圈子的束缚，同时也尝试用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阵营之外的亚非拉世界的“革命”范式——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念与目标，来指导中国的外交。

（二）中苏大论战与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的探索

追踪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由联盟走向分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早在1954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双方就开始出现利益纷争的苗头。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武器的要求，被赫鲁晓夫委婉拒绝。而赫鲁晓夫提出中国加入经互会的要求也被中国领导人当面拒绝。此后在1958年4—7月，中苏又围绕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展开斗争，再加上当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中苏联的不支持态度，以及1959年6月苏联背离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材料和样品，同时在当年8月发生的中印第一次军事冲突中偏袒印度，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使得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恶化，也导致中国对于苏联意欲控制中国的一系列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警觉和抵制。^②同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则更让中国认识到，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图保持核垄断地位，并欲将中国纳入其整个争霸战略。

后来的中苏大论战虽然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斗争来展开，但是其中争论的核心议题如时代问题、和平共处政策、战争与世界革命等，其实质是争论

① 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1955年4月5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② 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时，针对苏联的军事高压做法向苏联批评提出：“调动苏军，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军事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关系准则”。参见左凤荣、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1958年7月针对建立联合舰队问题，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你们在海军核潜艇技术方面不肯援助中国，相反要搞舰队合营，“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弹，就要控制，就要租界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30页。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

中苏大论战主要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其中在 1963 年 9 月 6 日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之间达到高潮，与之相伴随的是两党和两国关系走向破裂。早在苏共二十大上，苏联就提出“三和”路线，主张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搞缓和。^①但是在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的 1963 年 7 月，苏联一边与中国进行最后的两党对话，一边与美国展开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苏联的这种外交行动和立场显然很容易被中国理解为是要联合美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至此，新中国确立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下的革命哲学价值所指向的与苏联共同推动创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道路就此终结了，中国在论战中也逐渐明晰和强化了一条更加激进的外交路线。这种激进外交路线既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反对走苏联式的修正主义道路。其中所蕴含的国际革命秩序观既反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也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苏关系决裂和中苏论战将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外交引向了典型的“反两霸”道路，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看来是缺乏理性逻辑的，但是在革命哲学的实践理性逻辑上却证明了万隆会议后中国摆脱苏联控制，在两大超级大国之外探索独立外交路线和国际秩序目标的合理性。只不过众多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形成的共识是以中间路线和不结盟运动的方式抵制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战略和控制，而中国则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对抗性的外交哲学和外交路线。这种激进的对抗性外交路线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一度将中国的外交带到极为紧张的境地，中美持续对抗，中苏关系破裂，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印尼与中国断交等，一时间中国外交全面绷紧，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和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外交才渐渐地走出困局，找到一种政治上能够融合平等哲学价值的外交哲学道路。

（三）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开展的探索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上“反两霸”和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所

^① 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苏联认为自身也拥有核武器之后，与美国发生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需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缓和。

造成的紧张对国家安全带来极为不利的局面，国家领导人对于这种不利局面相比国内政治变化要敏感得多，因此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其实，“中间地带”的说法早在194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就提了出来，不过当时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①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可能选择中立的“第三种立场”^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观点，开始把美国与英法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西方阵营出现的大分化大组合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将50年代提出的“两类矛盾”中的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予以突出，将其中的日本、加拿大以及大洋洲和整个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作“第二中间地带”^③。并指出以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核心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有一个共同立场和诉求，即反对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1969年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再加上苏联在全球和中国周边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敌人由一个变成了两个。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国际战略构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全球争霸的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般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看作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哲学中的价值内涵和中国自身的革命身份都发生了极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间地带”到60年代中期的“第二中间地带”理论，中国将西方阵营中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剥离开来，作为国际团结和开展外交的重要对象，这显示了中国力图摆脱“一边倒”政策实行以来的社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1992年版，第371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9页。

会主义阵营外交束缚的努力。但是，这时中国从理论认识上仍然没有从国际两大对立阵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直到“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第一世界”被单独提了出来，这就一下子突出了国际社会的矛盾焦点，抓住了国际政治斗争的要害，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坚持的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内涵也旋即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为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此为该时期中国外交探索的第一层革命性意义。第二层革命性意义在于中国终于从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束缚中自我解放出来，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第三世界的一员”。第三世界身份的革命性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价值上的，而是属于全世界所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身份，它属于国际政治经济权利价值意义上的身份，这种新的革命性身份为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乃至重新认识中国国内的道路都提供了重要指引，从而为后来中国在国内摆脱极端路线和阶级斗争束缚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中国的新革命身份也为自身从相对狭隘的世界革命者身份中走出来、进而面向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国家间的平等互利交往打开了大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奠定了思想哲学上的基础，为中国平等外交哲学价值内涵的酝酿做了理论准备。再进一步分析，这一理论哲学层面的转变还为中国发挥大国影响力和扮演国际引领角色找到了根基，从此中国的大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支撑，这也为中国外交探索新的引领哲学的价值内涵提供了新的坐标和方向。

二、平等哲学

平等外交哲学主导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平等外交哲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的外交实践中，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色彩太突出了，使得中国探索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努力几经波折，甚至是在经历了诸多教训之后才通过“三个世界”理论找到了平等外交哲学的入口。平等外交哲学特别注重和强调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的主权权利平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一

律平等，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长期并存，和平共处；在国际多边舞台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在发展国家间关系时强调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国际秩序方面倡导和谐世界；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

（一）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基础与核心

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基础根植于新中国前 30 年外交探索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后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一方面，在前 30 年外交探索实践中，中国经历了大国间结盟、对抗和总体上对外推行国际革命的路线，其中的外交实践曾将中国外交带到多重危机的境地，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和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困难。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身份和平等权利关系，能够最大程度化解矛盾和冲突，最大程度消除对立面和减少对抗，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争取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的国内战略目标，也必然向外延伸为以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条件与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外交战略任务。这样的战略任务必然要求外交工作尽可能地调动一切国际有利因素，与各国尽可能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而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最有助于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国家间各种差异和分歧，建立和拓展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

因此，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规律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出平等外交哲学价值的核心其实是发展和崛起。平等哲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政治主张和工具性价值，但其目的性价值却是中国的内政，即经济发展和崛起。这其中的目的性逻辑就在于：强调平等哲学的价值，才能消除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化解各方面的敌意和矛盾，才能广交朋友，营造和平有利的环境；强调平等，才能在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主导权的情况下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强调平等，才能顶住各种干扰和压力，坚持自己的发展战略和道路；强调平等，才能够在国际上把自己化为普通平等的一员，“决不当头”，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向国内建设，不受国际力量的左右和引诱，“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自身的发展。

纵观 1978 年改革开放至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这 30 年的中国外交，中国在贯彻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国内发展战略和执行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指向方面保持了坚定的战略定力，由此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中，平等哲学的价值指向不仅得以创立、完善和丰富起来，而且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逐步糅合了革命外交哲学和引领外交哲学的价值，持续深化到外交实践中。

（二）平等外交哲学主导的外交进路第一步：重新梳理和澄清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判断

平等哲学价值在外交上被牢固树立起来的第一步，就是重新梳理和澄清中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的判断。早在 1977 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时就提出，国际形势总体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①。1980 年 4 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说，“争取 20 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②。1984 年 11 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讲战争危险“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③ 1985 年 6 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明确判断。^④ 1987 年，邓小平再次做出了世界性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⑤ 正是在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上做出超越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才能反过来推动我们在国内发展道路上确立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战略。在国际国内战略上的新认识和新判断相互呼应和推动下，1982 年，十二大报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并明确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是明确宣布放弃过去长期执行的推动世界革命的对外路线，是外交政策和战略领域的“拨乱反正”，其逻辑结果也必然是在外交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7 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 页。

③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 页。

⑤ 同上，第 233 页。

上走出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束缚，走向同所有国家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规定中国的外交工作任务是“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①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再次确认中国外交工作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就说明中国外交已经真正从过去的革命外交哲学转变到以平等外交哲学价值为基础的外交路线上来，中国外交走出了自我划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由革命哲学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阵营小圈子，经过“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和“一条线”斗争路线的“半个世界舞台”，终于走向了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整个世界舞台。到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美欧日和金砖国家发展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和建立了成熟的大国关系，与中亚、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发展了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区域合作，以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比较新中国成立60年的外交变迁时，特别惊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在化敌为友方面的能力”，认为经过30年的外交努力，“中国完全处在和平环境之中，没有敌对国家”！这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极为有利，也十分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安全稳定。^②

(三) 平等外交哲学主导的外交进路第二步：全面融入世界体系，深度参与国际事务

以平等哲学价值为基础的外交进路的第二步就是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体系的大舞台，持续扩大参与，并最终实现了在全球经济、安全、环境和人权保护等各个领域的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谨慎地逐步恢复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参与。在防扩散领域，中国在198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继续宣称不参加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但也表示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82年1—12月)》，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美]沈大伟、黄语生：《中国外交60年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0—117页及第128页。

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① 在联合国维和领域，中国 1982 年开始主动缴纳维和经费，并于 1986 年补缴了自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至 198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拒绝承担的所有维和费用；1988 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并于 1989 年首次派遣 20 名观察员参加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② 在全球经济领域，1980 年初中国先后恢复了在 IMF 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于 1982 年迅速启动了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部长级会议、缔约国大会和附属机构会议。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中，中国还开始积极开展与 IMF 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为中国在中央银行体制、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获取咨询和帮助。同时，这种合作还使中国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建设资金。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内部的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的重大考验，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多次讲话中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并于 1992 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提出了扩大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改革建议和政治嘱托。在此指引下，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参与非但没有止步和退缩，反而大步向前推进。1992 年 3 月中国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8 年进一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了《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开始全面履行条约义务。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向多项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和军事顾问等，一跃成为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 1994 年和 1997 年还反过来向 IMF 分别提供了 1 亿特别提款权贷款和 1 313 万特别提款权捐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积极参与 IMF 的贷款援助行动，向泰国和印尼分别提供了 10 亿美元和 3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阶段就积极参与并成为其主要支持者、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84 年 6 月 1 日刊载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② 参见刘贞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国家利益分析》，《学习与探索》2015 年第 9 期，第 41—50 页。

推动者和首批签约国。从1995年起中国还参加了京都会议前的8次正式谈判，并积极批准和履行《京都议定书》，接受了编制、提交国家信息通报和国家清单的任务。2000年以后，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全面深度参与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各种体制安排之中，^①并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反恐和海上护航、联合国改革议程、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领域，开始扮演核心角色，成为贡献巨大、影响力广泛的“全球参与者”，被美国学者看作是“当今积极参与全世界事务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美国）”^②。

（四）平等外交哲学主导的外交进路第三步：走向外交新境界

以平等哲学为基础的外交实践向前迈进的第三步，就是如何跨越平等哲学自身价值，在更高层面实现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融合，指引中国外交实践走向新境界。2000年以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上迈开了快速增长和崛起的步伐，中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大程度的贡献，展现更大的影响力。在处理核争端和防扩散领域，中国积极主持和协调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在安全领域，中国于2002年开始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至2010年底共参加了1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7390人次，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派出人数。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中，中国自2008年12月26日开始派遣海军舰艇编队实施护航，至2010年底共派出7批18艘次舰艇执行护航任务，先后为3139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解救被海盗袭击船舶29艘、接护船舶9艘。^③在反恐方面，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将反恐军事训练和演习机制化，有效震慑了“三股势力”。在国际灾难救援、冲突地区战后扫雷排雷和医疗救助等方面，中国军队和救援队的身影已遍布世界各大洲和主要冲突地区。在对外援助方面，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以及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累计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同时

① 至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14500多人次。参见杨洁篪：《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纪念新中国外交60周年》，《求是》2009年第9期，第22—24页。

② [美]沈大伟、黄语生：《中国外交60年变迁》，第110—117页及第128页。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11年3月）。参见中国政府网，2011年3月31日，http://www.gov.cn/jrzq/2011-03/31/content_1835289.htm。

还免除了亚非拉和大洋洲 50 个国家的到期债务，金额达 255.8 亿元。^① 在重大国际责任担当方面，中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应对中向国际社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积极参与多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救助。2010 年，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的角色、责任和做出的贡献等，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期待。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越来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论和超级大国的各种遏制呼声纷至沓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奉行的以平等哲学价值为基础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开始面临新的考验。已经成长起来的巨大经济总量、对国际体系的全面参与和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影响力等，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难以依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方针来回避自己的大国身段所对应的责任和担当了。中国被期待和要求在各种国际挑战和矛盾焦点方面表达立场、提出方案和承担义务与责任。当年革命外交哲学所追求的塑造新秩序的理想和愿景在改革开放 30 年之后全世界林林总总的问题中被提了出来。同时，中国在深度参与的众多国际事务如发展援助、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等领域，也在以自身的力量和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塑造效应，这种影响和效应既有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也有受到非议和负面评价的。如何发挥自身影响力，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都期待的国际体制和秩序，这些都呼唤着中国外交哲学对于中国的引领角色和作用做出理论价值层面的回答。

三、引领哲学

引领哲学强调中国在外交上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其与革命哲学具有某些方面的重合之处，都关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现状存在的不足。但二者在方法论上具有根本的区别，革命哲学更强调推翻和替代既有体系秩序，更注重斗争、对抗和革命的方法与外交路线；而引领哲学更注重现有体系秩序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 年 4 月）。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1 年 4 月 21 日，<http://www.scio.gov.cn/m/zxbd/nd/2011/Document/896471/896471.htm>。

的变革和完善,更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开拓创新来积极担当责任。再进一步深入考察,引领哲学衍生于一个国家利益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国际关系网络之中,其中国家间的安全、利益和各项重要关切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时代和命运共同体中。如果由此出发来考察引领哲学发挥其价值指引的历史时代,应该是早在中国认识到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时刻,引领哲学就已成为外交行为的价值指引。事实上,引领哲学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是能够在整个和平与发展时代发挥指引作用的。只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方面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已,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自身的影响力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和做出更大贡献的期待,就已经呼唤引领哲学的价值来指引中国外交实践了。

(一)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逻辑指引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 2010 年中国在经济实力上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引领哲学所强调的中国在外交上扮演更加积极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的实践要求更加突出了,引领哲学在中国外交的更多实践领域超越了平等哲学的价值逻辑,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行为的逻辑指引。

客观地说,由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以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都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平等哲学的价值指引作用并未被引领哲学所取代,甚至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被削弱,在这些领域引领哲学的价值毋宁说是平等哲学的价值在外交实践上的进一步深化,如全球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义利兼顾等。同时这一阶段也还保留着革命哲学的重要价值,打破与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国际现实严重不匹配的国际体制安排,改变自身的国际地位,争取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国际权利、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等,就成为一项优先性的外交任务;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发言权等也是革命哲学追求的重要价值。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深化平等哲学价值的外交和推进国际体制变革及自身权利地位提升的革命哲学的外交并重,而引领哲学的价值和外交实践经过 30 余年的自我克制和沉寂之后就

再次获得新生。新时代的引领哲学指引中国外交在实践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特别注重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发展领域积极扮演引领者角色；强调引领新型全球化，打造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强调引领全球发展，以新型、更高层次的国际多边发展融资机制引领全球发展融资；以共商共建共享，“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和国家间发展战略对接的方式引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合作，以“一带一路”项目、工业园区建设、双边投资协定等引领发展中世界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同时，在政治、安全和外交关系领域，新时代引领哲学也指引中国外交实践积极开拓创新，如以新安全观引领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区域多边组织走向更加完善，以结伴不结盟引领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形成理想世界秩序。

（二）引领外交哲学指引下的开拓创新

第一，在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下，中国外交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在打造新型全球化和引领全球发展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就，成为中国外交中引领哲学的主导性领域。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发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推动了“一带一路”合作的机制化建设进程，推进了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合作。截至 2018 年，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沿线 11 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沿线国家合作创建了 80 多个经贸合作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创立以来，已经批准了 40 多个项目的贷款，项目惠及 16 个国家，批准金额超过 80 亿美元。而据估算，未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每年资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金额将达到 100 亿美元，这对于克服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极度短缺的状况带来了新的解决方向。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前几年的测算，全球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资金缺口每年在 1.6 万亿至 2.5 万亿美元之间。^①可以说，中国积极推动的新型全球化建设，将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在 2000 年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方案中，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不低于其国民收入的 0.7%，但是多

^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世界投资报告 2014：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9—152 页。

年来经合组织（OECD）国家提供的援助支出不足 0.3%，有的国家提供的援助甚至还不足 0.1%。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更是不断减少。与之相反，来自新兴经济体和新型发展融资机构提供的资金和外来直接投资却连年增长，2015 年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额的 4 倍以上，由此带动的对外贸易额更是高达官方发展援助额的 43 倍以上。^① 这说明，由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已经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资金和实现发展的重要渠道和希望。^②

第二，在政治、安全与国家间关系领域，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也使中国外交取得了新的成就，使之成为引领哲学价值日益凸显的重要外交领域。在双边外交领域，至今中国已同 100 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已经成为打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共识和重要方式。两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吸引了 150 多个国家和 90 多个国际组织参加。在多边外交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已加入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的国际多边协议也有 400 多个，多边外交舞台越来越认同中国提出的外交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文件。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3 月 17 日，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在 9 月第 71 届联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被写入大会决议。中国倡导的这些理念被一次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说明哲学理念价值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所开拓的外交创新已从为国际社会贡献经验和方案，朝着贡献智慧和价值理念的层面提升和发展。这预示中国即将开启一个新的外交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大外交时代，引领哲学的价值将指引中国成为一个外交上

① 相关数据引自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135—155 页和第 160 页；黄超：《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国际展望》2018 年第 3 期，第 29—49 页。

② 刘贞晔：《全球大变局：中国的方位与出路》，《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 期，第 32—41 页和第 141 页。

更加成熟，战略上更加自信，价值理念上更富有时代创新意蕴与充满中国智慧的引领者和塑造者。

四、理想、现实与当下

回顾 70 年来中国外交走过的历程，考察和总结中国外交哲学发展的进路，无论是革命哲学，还是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实际上都涉及如何定位中国外交所追求的理想价值和目标，如何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现实，如何找到可行的能付诸实施的路线和策略的问题。

（一）理想

70 年中国外交哲学演进中的哲学问题至少包含这样两个核心问题——大国意识（情怀）和理想主义。

第一，大国意识与情怀。大国意识与情怀在 70 年中国外交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特别是当下中国外交定位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但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中，我们在外交上奉行“韬光养晦”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也曾严肃地提醒外交部门的同志，“中国怎么也是一极”。至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无论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间地带”，还是 70 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抑或是“反两霸”和“一条线”战略，都反映了典型的大国意识。这种大国意识相对于当时尚贫弱的国家实力来说，似乎用普通的国际关系理论很难解释，但它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外交实践中，以至于有日本学者在分析中国外交哲学时干脆建构出了一种“虚”的外交分析框架来专门分析中国外交哲学中的这种“大国意识”。^① 考察历代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意识，应该说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情怀，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有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中，历代仁人志士既有“天下”情怀，更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地理版图和人口规模上的大国身段，使得“平天下”，变革不

^① [日]天儿慧：《中国的外交哲学思想及其 21 世纪国际秩序观》，《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15 年第 2 期。

公平不合理的天下现状和打造一种天下富足与太平的理想秩序，成为历代政治家的理想抱负和情怀。而正是这种“平天下”的情怀，使得中国政治家的大国意识不是以现实主义，而是常常以某种理想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如革命外交哲学中的“世界革命”理想，“只要中国的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始终站得住脚”，建设“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循此路径，我们会发现早先的“乒乓外交”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用革命哲学不容易解释的战略，通过大国意识和情怀则能够得到更好的阐释。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革命哲学是否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有？中小国家更多的会在理性上选择跟随战略，而且的确在二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更多国家跟随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当时处于经济和政治边缘化地位的中国，要争取自身的权利、利益和影响力，避免被贬为与其他中小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等的地位，若采取革命哲学的价值观，就能够从革命逻辑上根本否定两大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否定西方大国主导国际体制，从而为自身的大国地位寻找合理定位。不过没有国家实力做后盾的这种革命哲学在实践上显然有些超前和“冒进”。大国地位和“大国意识”离不开相应的国家实力作后盾，意识到大国地位旁落，恰当的战略不应该是夺取政权后还不断“革命”，而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的战略，这种快速发展和崛起的战略直到邓小平复出之后才找到，中国才坚定地从不间断革命的循环中走出来，为自身的成长和崛起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战略道路。

不过就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看，在一穷二白和千疮百孔的落后国情基础上，在两个超级大国垄断和瓜分国际权益的特定时代，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仍能够毅然决然地修正和抛弃“一边倒”的追随战略，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的大国道路，这充分显示了革命年代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气魄和抱负。即使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大国意识方面保持了更多的自我克制，但是“我们怎么也是一极”的气魄也仍然能够让人们感受到革命家身上那种由大国情怀而生的浩然之气。

第二，理想主义。提到理想主义，有些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会常常提到西方始自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各种理想主义。其实中国外交哲学中也包含了典型

的理想主义，并且常常与中国的大国意识和情怀相伴而生。上面提到的“世界革命”理想等，其理念中就包含了典型的理想主义成分。与其他文明中的理想主义价值相比，这些理想主义理念的价值似乎都比较宏大，都是从世界、国家和全人类的角度才能理解得了的价值。而这些理念价值要走向世界并被普遍接受，就必须面对诸如权利、自由等在世界上流行甚至是在许多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小”价值，它们的价值关怀所在常常更具体到族群、社区和个体等。这两类理想主义价值之间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是需要找到或者建构出能够相互包容、相通甚至可嫁接之处，这样才能够使彼此的“小我”价值和“大我”价值和平相处而不是隔阂和碰撞。尤其是当中国外交哲学中引领哲学的价值更加突显之时，我们更要考虑这些“大”的价值如何向“小”处延伸，成为能够被世界上更多文明所理解和接受的普遍价值。

（二）现实

考察 70 年来的中国外交哲学演进历史，特别是由起初 30 年的革命哲学为主导的历史转换到以平等哲学为主导价值的之后 30 年的历史，我们会体会到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对它们的认识却具有主观性，其偏差是中国外交在头 30 年里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邓小平在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的时代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等许多至关重要问题的判断上高瞻远瞩，中国外交路线才实现了“拨乱反正”，走上了正确的航向。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就是邓小平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现实相符，没有出现偏差。

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启示，即中国的外交决策只要提高认识水平，避免认识偏差，就有助于我们外交工作的积极开展。

（三）当下

古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考察和分析中国外交哲学过去 70 年的演变，总结和思考其中的问题，最终是要落在脚下，采取有效办法和可行方案解决问题。总结新中国 70 年历史经验，宝贵的经验有很多，其中最宝贵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很多场合多次强调的重要观点，同时也是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外交历史得失得出来的宝贵经

验。回顾过去 70 年，凡是成功的地方都是凝心聚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发展好自己；凡是出现重大失误的地方都是背离了这一条经验，受各种干扰困扰，把宝贵的资源和精力耗费在了错误的方向上。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外交面临巨大压力和各种国际干扰，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① 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谈话中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②；我们不在乎别的，“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③。他反复告诫：“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④；也就是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⑤。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到 90 年代初，邓小平时时告诫“不要当头”，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⑥ 要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⑦

这些讲话在今天来看，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说到底，无论我们的世界理想有多么美好，大国意识和抱负有多么宏大，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发展好，有了坚实的国家实力，才能真正赢得与此相称的大国地位和权利，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开启的平等哲学的外交实践，是一种补课，补大国实力的课，补发展和崛起的课。“发展是硬道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不仅在国内战略上是硬道理，同时在国际战略上也是硬道理！

今天中国的外交处于引领哲学为价值指引的初期阶段，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有了巨大提升，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众多领域都已经在扮演引领角色，发挥重要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也还要看到，中国与世界上最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1—312 页。

② 同上，第 358 页。

③ 同上，第 360 页。

④ 同上，第 321 页。

⑤ 同上，第 375 页。

⑥ 同上，第 250 页。

⑦ 同上，第 249 页。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少技术和经济领域还有较大差距，在这样的领域还谈不上引领。甚至相反，我们还需要在这些领域学习，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学习和借鉴就离不开虚心诚恳，就要有学习的低姿态。平等哲学价值所指向的强调平等，把自己化为国际大家庭中普通平等的一员，“不挑头”，不受国际力量的左右和引诱，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向自身建设，“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发展好。这样的价值指引在今天仍然应该成为我们的外交哲学内容。

当今世界处于大分化、大变革之中，中国的国内建设和对外交往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外交逐渐进入异常复杂的深水区，需要平衡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三重外交价值，而且需要在外交实践上得到较好实现。这就需要在政治上更加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异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同时也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艺术，来平衡把握和保持国家崛起、扩大合作和外交发力三者之间的适当关系。今天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经过近几年来的开拓，在外交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外交哲学理念上提出了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创新性理念，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中，中国外交在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这一系列外交哲学理念的指引下，必将走出一条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之路，从而把中国外交带向一个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陈鸿斌]